



刘寿祺革命回忆录

熊清泉题



刘寿祺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PDG

目 录

自序	(1)
童年、少年、青年时期	(6)
1. 坎坷的童年	(6)
2. 少年的耕读	(7)
3. 艰苦奋发的青年时期	(11)
由三民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23)
1. 从民范女校到醴陵乡村师范	(23)
2. 在醴陵国民党县党部内的斗争	(24)
3. 《教育与政治》一文的发表	(25)
4. 探索教育改造社会的道路	(30)
5. 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进步据点	(34)
6. 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40)
在教育厅期间	(43)
1. 协助筹办塘田讲学院	(43)
2. 随迁沅陵、来阳途中	(44)
3. 为孩子剧团公演募捐	(47)
4. 送别、壮行	(48)
5. 抚育雏燕的成长	(55)
6. 国立十一中学师范部的斗争	(57)
7. 去延安的准备	(59)
重庆纪行	(60)
1. 潇潇风雨上渝州	(60)
2. 想方设法寻亲人	(61)

3. 沙坪坝上的点点星光	(62)
4. 嘉陵江畔的怒涛	(70)
(1)从“救亡会”到反特斗争	(70)
(2)掀起“一·二五”运动,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72)
(3)“二·二二”反动逆流	(75)
(4)“三·八节”的怒吼	(77)
(5)夺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80)
(6)两把伞	(81)
(7)为了党的工作不能走捷径	(87)
担任南京梅园、上海南方局联络工作的一段	(93)
1. 董老的谆谆教诲	(93)
2. 南京中央大学的斗争	(97)
3. 雨花台凭吊述怀	(105)
钱瑛同志对湖南地下党的指导	(108)
1. 看电影的秘密	(108)
2. 护送周里同志到上海南方局	(110)
3.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111)
4. 奉命去港九汇报策反工作	(114)
湖南和平解放中的地下斗争	(117)
1. 从南京回到长沙	(117)
2. 建立地下联络点	(118)
3. 参加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	(119)
4. 参加争取唐生智、李觉的工作	(124)
5. 争取姜和谦、刘鸣球	(127)
6. 组织“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	(130)
7. 策动各界人士参加湖南和平解放运动	(131)
8. 去邵阳执行三项任务	(137)
解放初期湖南教育事业接管经过	(141)

1. 接管前的准备·····	(141)
2. 接管的经过·····	(142)
3. 接管后的措施·····	(146)
附录:思思工学社与武冈第一代共产党人 ·····	(152)
编后记·····	陈新宪(193)
跋·····	陶蒲生(199)

自序

人能活上九十个春秋，大概也是一件幸事吧！离休后，人闲了，心却闲不下来，历历往事总是不断地浮现在眼前，我不时将这些“旧影”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案头上的这叠“回忆”。

我们，生长在清朝末年，成熟在民国时代，奋力于新中国之诞生的这一辈人，其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从政、从军、从教或从事于其他社会改革事业，大概都曾经历过一段坎坷，走过一条艰难而崎岖的路。所谓“崎岖”，当然是回过头来看才看到的，在当时，所有的“崎岖”都是作为直道走的。这种“回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虽然不会再有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爬上光明顶点的那种艰难、那种曲折，但总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仍得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这本“回忆”正是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才出版的。

我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就向往光明的社会、光明的中国、光明的世界、光明的人生。总之，是希望大家都活得好一点。这是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我出生在一个十分贫苦的农村，对贫苦又有了一层更深刻的体验。我从小见到的人们中的十之八、九生活苦极了。我在家乡先是读了点旧书，后来又读了点新书，有点文化，很想用自己的这点本领让别人活得更好些。“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年，我来到省城长沙，就读于第一师范。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把我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青年冲得天旋地转，我做了许多的好梦。在一师和老师同学们一道，组织起湖南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担任了《大公报》出版的《文学周刊》的编辑；在《文学周刊》上，我曾发表过多篇小说、诗歌、

小型剧本和论文。此外，还发起组织了“儿童文学研究会”、“小学教育研究会”，创办了《武冈同乡会会刊》。对鲁迅在1922年所写的《呐喊》序言中提出的“改变国民精神”的杰出见地，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十分崇信“文学救国”的主张，很想走上文学这条路。但我毕竟没有多少文学天才，一师一毕业，靠写作挣不了饭吃，我于是投考私立晨光大学，半工半读，一边做教务员，一边攻习文史。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革命的南方虎虎有生气，仿佛一个光明的中国就在眼前了。谁知不久“马日事变”就在湖南发生，我第一次见到同学们同事们流淌的鲜血！我也曾主张革命，主张推翻那“吃人的筵席”，这鲜血使我惶惑起来，直觉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不会让中国人民过什么好日子的，我既不是“振臂一呼的英雄”，也不甘愿堕落，于是做了个学校教员，转而主张“教育救国”了。说也奇怪，我发觉自己很适合于教书。一上讲台，面对着青年学生，仿佛眼前就是光明，自己没有力量，未来总会是有力量的，自己也仿佛成了能创造世界、能带来光明的“救世主”。此后我在民范女子职业学校、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员、教导主任，教了好几年书。但教来教去，又发觉学生毕业后，多数也只是成为一个多了点文化的个体，社会还是那个旧样子，这些“个体”在这种社会中依然起不了多大作用，光靠教育恐怕是难于救国了，旧的教育方式不改变，教育本身也不会有什么出路，恰好其时民众教育、乡村义务教育这些新教育思潮正蓬勃兴起，而湖南又是兴起这一思潮的源地。1935年至1937年，我全身心地从事于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的工作，想从这里闯出一条生路，这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只是局部性的。按照这样的步履走下去，中国何日才得光明？我又惶惑起来。这时一条真理开始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不改变政治现状，教育是没有出路的，这条真理当然不是我自己的什么“顿悟”，而是在实验区工作时，结识了好些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是他们教给我的。1938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我的履历表上又新添了一个

“政治救国”的内容。我从湖南省教育厅到中央大学，任校长室秘书，随后又调任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专员、督学，虽然没有离开教育这个阵地，但主要精力已放在党的地下工作上去了，我在龙潭虎穴之中，以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自然少不了会遇到危险，但一想到光明的新中国就在眼前，这点危险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这本“回忆”中的大部分记录了这个阶段的活动内容，我并非想借此来为自己画什么“光圈”，我只是想说明曙光在前，她就能给人以神奇的力量，去飞越那些寻常时刻所难于飞越的障碍与险峰。新中国成立后，我分配在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工作。几年之后，于1955年派任湖南师范学院筹委会主任，筹建湖南师范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教书本是我的宿愿，因此我非常热爱这个岗位，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之中，奋斗十年，这所新型师范学院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之下，日新一日，蓬勃发展，为湖南的大学、中学以及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合格教师，也为各级党政部门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象狂涛一样冲击着整个神州大地。在这场浩劫之中我被剥夺了全部工作权利并被关进“牛棚”。1970年中秋前夕，我七十岁生日那天，造反派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斗争我一整天，批来批去，无非是说我不该团结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办教育，贩卖“封、资、修”。办教育培养人才，居然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这倒是天下奇闻。偌大一个国家，十亿人口，怎能不要文化，不要教育？因此我坚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何况当时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从一开始就不在文化范畴之内，不过藉此而为政治斗争服务罢了。这天我回到牛棚后，填了一首《如梦令》：

云淡、风轻、月皎，夜静、更深、人杳，清梦醒来时，屈指年华去了。去了，去了，且待东方日晓。

韶华易逝，岁月难留，待到还我自由，自己差不多快八十了，想再做事，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能埋头写点东西，以为教育这个

百花园添点秀色。

我的一生平凡而又平凡。就是这样一名平凡的知识分子，凭着热爱祖国，同情劳苦大众，日夜向往光明的一付热心肠，奋力前进着，而道路却是这样崎岖，我想这原因只能归之于时代，这是时代的产物。祖国、人民处在黑暗的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有直道可循。我在本文开篇时曾提到，今天的道路比我们那个时代平坦多了，但不是说从此就能一帆风顺，可以不费力气地达到胜利的彼岸，祖国、人民赋予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依然是十分繁重的。回顾老一辈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取鉴一些历史经验我想不无益处。

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生活在国家、民族多难之时，古语有云：“家贫出孝子，国弱出忠臣。”国家多难，人民多难，一种救国救民的时代责任感，始终萦回在我们心中。为国家，为民族，薪可卧，胆可尝，从来不拜倒在金钱和物质面前，也不为虚名而舍却自己的信念。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一种为祖国、为人民“愿拚却男儿血”的精神财富。一个民族没有这种财富，是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人缺乏这种财富，也就不会有什么前途了。

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追求明天的希望之中，现实虽然很痛苦，也很残酷，但坚信有明天的光明。向往光明，追求光明，不停地奋斗。我认为这又正是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的另一精神财富。为了美好的明天，他们总是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既不无端辱骂自己的祖宗，也不顽固地坚持昨天样样都好。勇于探索，勇于效法，勇于创造，勇于革新。世界在前进，人类在前进，一个民族不能随着时代的步履前进；无论怎样美好的文明古国，它也只能留下一个古国文明去供后人回顾与观赏；一个人不能随着时代的步履前进，他必将为时代所抛弃。

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

道路。各种各样的救国主张和救国方案，虽不能说全属无补于时，但都不曾接近真理的边缘。最后是中国共产党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指引，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辈知识分子的又一精神财富。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今天，事实已经证明，一切稍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党的春风化雨之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不依靠共产党，全心全意团结在党的周围，就不会有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

当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幸福，向往光明；依靠党的领导，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今天又有它的新内含，这些真理的付诸实践，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对这些真理的普遍性原则，却是不能怀疑、犹豫和动摇的。

这本“回忆”的草就，原意是想回望我自己这一生的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能不能心安理得地去见上帝，并没有想到将它出版。教育界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要将它付梓，这倒又使我有些惶惑了。好吧，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中极平凡的一员，如果这本回忆录多少也能反映出我们那个时代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某些精神面貌，并能略有补于今日教育界之后起群英，则于愿足矣！

刘寿祺

一九九〇年八月写于长沙，年九十

童年、少年、青年时期

1. 坎坷的童年

寿祺这个名字的来历颇有点意思。原先，我的奶名叫“福堂”，父母取的。为什么他们会取个这样俗气的名字呢？是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遇着全县大旱，家中四亩薄田，颗粒无收，想取这么个名求点福禄。我1901年8月出生，母亲不仅没有奶喂我，就连米汤水也不是常能喝到，村里的人有些被饿死，有些出外逃荒。我家人多，有祖母、父亲、母亲、三个姐姐、两个兄长，共九人（后来还有一个弟弟），离开家乡，无法生存。幸而屋后是几座高山，有蕨薇、树叶可摘，有葛根可挖。1901年的秋冬和1902年春夏就是这样度过的。父母好不容易把我这条小生命养活下来，但由于我一出生就缺乏营养，肠胃经常生病。两岁时，祖母去世，因坟山问题，与人发生诉讼，乡下人打官司谈何容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父叔辈为了把祖母安葬下去，迫不得已忍痛变卖了仅有的一点土地，才把这场官司了结。接着大哥又病死了，大哥刚十六岁，正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劳累过度，体质衰弱，突患急病，无钱治疗，父亲虽跟祖父学了一点医术，但遇到这样的急病、重病，也无可奈何。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父亲、母亲悲痛欲绝。我五岁时，兄、姐稍长，能帮父母劳动了，家庭生活略有好转，但我因长期患肠胃病，仍然骨瘦如柴，像个没长毛的小猴子。八岁时，我就参加劳动，看牛、捡柴火、找猪饲料等，这些都是每日必做的事。有时，还要摘桐子叶挑到小镇上去兑盐巴。十岁以后，我开始参加田间劳动，如拔秧、插秧、踩田清除杂草、种豆子、插红薯秧等等，但仍很瘦弱，肠胃病经常纠缠着我。

2. 少年的耕读

我另一个名字叫翰先，这又是怎么个来历呢？十三岁时，父亲认为人要在社会生活，总要认识和会写几个字，至少能够收帐，七月半能为祖宗写包封；如果能诵经文、写祭文，村里办红、白喜事，能帮助写对联就好了；如还能写状子、禀帖，免受他人欺侮，那就更好了。父亲开始送我读私塾，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连续读了四年，农忙时，参加田间劳动，或上镇购买油、盐等杂物。四年私塾读书不少，开始不到一个月，就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半年读完《论语》，一年读完了《四书》；第二年读完《诗经》、《尚书》、《易经》等；第三年读《唐诗三百首》、《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第四年开讲，由塾师讲解《论语》、《孟子》等，并学作文、写诗、作对联等。私塾老师是想培养这些蒙童能记帐、写祭文、对联，学得好的能写禀帖、状纸，以满足家长们的要求。

我虽精瘦，却还聪慧，也很跳皮，学做对联的时候，有一天，老师看见晒谷坪里有几个篾匠在编织箩筐，他随手拿了一片篾条，抖了两下，问学生说：“此篾似蛇，问弟子何分头尾。”要大家对下联，大家思索一番，无人应对；我看到晒谷坪旁有片油菜花，灵机一动，略带讥讽地对着老师说：“这花如金，请先生辨别真伪。”老师说，是对了，但对得不好，同学们都拍着手说：“对得好，老师没有分清真伪，把篾片当作蛇。”老师解释说：“我说是似蛇，不是说就是蛇，有何不分真伪呢？”我回答道：“我说如金，也不是说就是金，有何对得不好呢？”大家哈哈大笑，老师也笑了。又有一次，老师还未来馆，同学们在馆里捉迷藏，我用腰带蒙住自己的眼睛，在馆内乱撞乱摸，把桌椅搞乱了，老师来了很生气，在桌上一拍说：“这样胡闹，成什么体统，谁带头的？要打十大板！”同学们都站着不敢做声，眼睛都望着我，我把手掌向老师伸去，叫一声“打”！于是同学们一个接一个把手伸向老师说：“打！”老师看到大家都把手伸向他，即改口

说：“今天你们闹得太不像话了，处罚也不同，我出一幅对联，如果对好了，只要把桌凳归原摆好，免打手掌，如对不好，另行重罚。”同学们都默不做声，老师即提出：“山上加山推出去。”同学们听了有点害怕，“这不是不让我们读书了？”我也在想：这副对联对不好，恐怕是要挨板子了，我默不做声，眼睛直望窗外，看到远远的路上，温塘秀才爷骑着一匹马往镇上去，我灵机一动，叫道：“对起了，‘门内有马闯进来’”。同学们拍掌喊着：“对得好”。老师说：“对是对起了，但对得不恭，你那个‘闯’字，比我那个‘出’字，上了一个字。”我笑着说：“老师，你不是说过，后来居上吗？有什么不恭的呢？”老师正经地说：“好了，好了，今天不处罚了，大家把桌凳摆好。”然后老师把书翻开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今天就讲这几句。”

家长们认为这位老师很负责，学生都有不同的进步。中秋节晚上，有的拿来了红薯饼，有的拿来了仙子糖、南瓜饼、花生、葵花子、藕片、炒玉米花等，来敬奉老师，老师也非常高兴，预先到镇上买了一枝黄札笔，准备奖给学生。那天晚上月亮很好，多数家长来了，老师说：“今晚家长都来了，大家很高兴，你们也读了几年书了，我想当场试一试，请家长看看你们的成绩。”家长们说：“请先生尝一点我们自己做的点心，没有别的好东西敬奉先生！”老师说：“那好，同学们先向孔夫子神位作个揖，然后再吃。”我忙说：“我们同学还应当向老师作个揖，感谢孔夫子，感谢老师！”行礼以后，老师非常高兴，说：“大家吃点家长送来的点心，然后我出一个对联，对好的有奖”。他把那枝黄札笔拿起来向同学们亮了亮：“你们读了《声律启蒙》，其中有‘来鸿对去燕’，我就以这句为题，‘来鸿冲霄揽月桂’，同学们大家对，请家长们看一看。”家长们说：“我们不懂呀！”老师说：“不要紧，我懂，对得好不好，我看得出来。”家长们向着同学们说：“大家对呀，老师有奖啊！”同学们想了一阵没有出声，都把眼睛盯着我，我低着头细声地说：“怕对得不好！”同学们说：“你说出来

大家听一听。”我吞吞吐吐地说：“去燕掠地捕蜻蜓。”同学们拍手笑道：“对起了，对起了。”老师说：“对是对起了，对得还不大切，月桂是植物，蜻蜓是动物，所以不算对得好，但总算对起了。这枝笔就奖给他。”老师双手把笔送我，中秋赏月就在这样的欢乐、热闹之中过去了。

中秋过后几天，老师提出：“你们已经学了做对联，还要学做诗，今天我先写几句，你们能做的也要学着做，做得不好没有关系，做诗是有平仄的，你们初学，不讲究这些，只要是七言或五言就可以。今天的题目是‘春风’，我写四句七言大家看一看。”

春风吹得百花开，杨柳青青燕子来。

桃李芬芳人喜悦，尔侪努力自成才。

老师吟了诗后，要大家仿做，我思考了十多分钟，也写了四句递给老师，老师接过来看了看，当着同学们的面吟道：

春风吹得百花开，牧童吹笛骑牛回。

池畔蛙声催谷雨，端阳五月把秧栽。

接着他说：“不过端阳五月，有点重复，我看你会读书，为什么还要去牧牛、插秧？”我说：“父亲明年不要我再读书了。”

过了一天，老师到我家，对我父母说：“你家福堂很会读书，是个有出息的人，如果现在还有‘科举’，他一定能中个‘翰林’。”老师还藉口为我算了个“八字”，命中金、木、水、火、土齐全，有“文昌星”相助，不是平庸人。老师特来告诉我父母，并为我取了个名字叫“翰先”，意思是在翰林院里还要位列人前。我母亲听了似乎得到一点安慰，父亲却不大高兴，他说：“现在民国了，还有什么‘翰林’、‘举人’！何况我家世代耕田，没有读书种。”老师又说：“三爹呀，我是看他会读书，为他取一个新名，说明我的期望，没有别的意思，不是来讨好你们，更不是要你们什么东西。”母亲看到他们话不投机，有点过意不去，忙说：“他爹呀！不要说了，老师是好意，福伢子读书有进步，应该感谢老师，功名嘛，我们作田人家，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只

要他认几个字就可以了，至于写禀帖、状子，他爹是气头话，因为我们受欺侮太多，想出口气，请不要见怪呀！”老师笑着说：“那里会见怪，我知道三爹是个忠厚人，说话直爽。”老师离开我家后，父亲还说：“我听不进耳！什么‘秀才’、‘举人’，有么子用！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不是坐私馆！”母亲说：“老师是为福伢子另取名字来的，你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们不叫这个名字就得了，老师是好意，不要再说了。”这名字我父母始终没有叫过，我自己也从来没用过，别人就更知道了。

读了四年私塾后，父亲认为识字够了，不要再读书了，家里需要劳动力，因此我又参加了田间劳动。

半年田间劳动后，族祠兴办高、初两级小学堂。族里有人听说我会读书，许多长者都来劝我父母送我上小学，并号召“信公祠”所属的优秀后裔，能入学的都劝入学。父亲开始听了很不高兴，说：“洋学堂有什么读的，读了四年私塾还不够？”经过族长多次催促，才允许我考入族祠小学堂高级班，读了一年半，还差一个学期毕业，小学老师都认为我能读书，思想敏锐，理解力强，主张让我到镇上去投考清末南员老爷李钟奇创办的“蓼湄中学”。这是一所四年制中学，要有盖了县知事大印的高小毕业文凭才能报名投考，我还没有毕业，怎么办呢？两位很热心的老师出了一个主意：去年有个高小毕业学生叫刘寿祺，当兵去了，一直无音信，有人说他死了，就借他的文凭去报考吧。但改名字一事还得告诉我父母，征得他们同意。于是两位老师又专程到我家里，找我父母商量说：“三爷三婶呀！你家福堂在高小书读得好，国文、算术、自然常识都不错，老师、同学都叫他的奶名，好象不大合适，我们想再为他取个名字，叫‘寿祺’。你们二老叫他福堂，是希望他将来有福，不再像他小时候那样多灾多难，我们认为有福还要有寿呀！没有寿还有什么福呢？他大哥读书不多，能写能算，农活都能干，可是十六、七岁就夭折了，可见寿比福更重要呀！学校为他取名‘寿祺’，就是希望他长寿，在学

校里我们老师和同学都叫这个名字，至于你们长辈和村里的兄弟辈，仍可以叫他福伢子或福堂。”母亲听了两位老师说的话，觉得有道理，就答道：“这个名字好！”父亲也说：“这个名字要得！我们作田人家有‘寿’就是‘福’呀！”母亲还高兴地加上一句“多福多寿，阿弥陀佛！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见我父母都喜欢这个名字，就放心了。

我投考镇上中学被取录，大家很高兴，但每学期要缴纳学费两圆，每月缴纳膳米二斗五升、菜金五百文。父亲又不赞成再读了，说：“入洋学堂读书有什么用？温塘村的希楚先生，不是在宝庆洋学堂毕业的？现在教私塾都教不好，有什么用呀！就是教私塾，俗话说：‘家有一斗粮，不做孩子王，既不能养爹，也不能养娘。’不如我家老二，双肩挑担两脚走，还能养得一家身和口。（我二哥半农半商，农闲时到镇上买四、五十斤棉花，换成纱后，交给乡下能织布的妇女织成布，挑到武冈县城去卖，每年大约可获五、六十圆）不要去什么洋学堂了。”这样，我虽考取了镇上中学，由于不能继续缴纳学膳费，只读了四个月就回家了。这四个月，我学到了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如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特别是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扩大了视野，提高了思想水平。辍学后，坐在家里，如笼中之鸟，心忧如焚，两个月下来就郁闷成疾，卧病在床。

3. 艰苦奋发的青年时期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中学同学，知道我病了，特来看望，并告诉我：“听县里的亲戚说，现在长沙学校招生，有高农、有师范，均在县里初试，再去省里复试，省里确定武冈县招师范生四名，县里初试加倍半，保送十名。如你愿意到县里去初试，考取了，我们同去省里复试，到县里只有六十里，途中用餐午饭就到了，路上吃午饭你不要管，到了县城，我有亲戚，食宿都不成问题。”于是我决定投考师

范，因师范不要家里负担，同时，我也喜欢这个职业。后来，我被县里录取，心里又高兴又忧虑，身无半文，怎能去长沙复试？几位知心同学早想到了，不等我开口，就主动表示每人借一、二圆钱给我，一同去长沙，并约定时间，决定从高沙乘装米的小木船到宝庆（现邵阳市）。我如期赶到上船地点，几位同学已上了船，我急忙踏上跳板，船老板拦着我说：“看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去宝庆，如果你在船上有什么意外，岂不连累我？请不要上船了。”我请求船老板说：“我们几位同学是同去宝庆的，还要同去长沙参加考试，不要看我像有病的样子，其实我是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并没有什么大病，如果我死在你船上，把我的尸体丢到河里就是了，板子也不要你一块，绝不会连累你。请放心！我说的话，有这些同学可以证明。”这时，同学们也纷纷帮着央求、保证，船老板才允许上船。到了宝庆，大家穿草鞋步行，我虽走得慢一点，但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精神特别愉快；伙食也不错，所以我能勉强跟上大家。到了长沙，第一天住在旅社，第二天即到第一师范参加复试，武冈取录刘寿祺、蒋玉清、周继善三名，复试这一关很容易过去了。但学校挂牌，凡取录各生要检查身体，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想起在高沙船老板拒绝上船的情况，真正担心。幸而有个意想不到的机遇。当时只有湘雅医院能全面检查身体，而“五·四”运动后，人们与该院的隔阂很深，认为该院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大本营，而且湘雅医学院要做人体解剖，人们就更认为这是拿中国人做试验品。当时湘雅医院主持人多是外国人，他们则认为第一师范反帝最积极，不愿来为该校新生作身体检查，一师校长易培基是个有骨气的人，湘雅不来人检查，学校就挂牌所有取录的学生，先行入学。检查身体的事就不提了，这一关也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一关怎么过呢？我离家时，只带两套内衣裤，一套夹衣，一套罩衣裤，用一床卧单包着。没有棉衣裤，气候一天天寒冷，怎样克服这个困难呢？心里很着急。有一天，陈奎生老师上体育课，要大

家跑步，同学们都跑得汗流浹背，脱掉衣服，去洗了个澡，半天不感觉冷。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于是每天早晨，我比同学先起床一个小时，到操场跑步，雨天则在走廊上跑，出一身汗，到澡堂洗一个澡，再自习两小时，毫不感觉冷（一师澡堂有八个大锅桶灶，烧老糠，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热水）。吃了早饭，肚子饱了，上两节课，也不感觉冷。到课间休息（那时还没课间操），又到操场跑步或做其他运动，使全身发热，再上两小时的课，也不感觉冷，这样上午就过去了。吃过午饭，肚子饱了，下午可以好好上两小时的课，如果天气冷，又去洗个澡，再去自习、开会或做其它活动。晚饭后，自习两小时就寝，睡前还一定要洗一个澡。我来长沙时，只有一床卧单，幸好蒋玉清同学带了一床棉被，两人合睡一铺，垫的东西就只能买点稻草，盖上旧报纸，再加上一床卧单，就这样过冬了。

学校伙食办得不错，中午、晚餐都有点荤菜。这样，我的身体一天天健康起来，特别是运动、洗澡的习惯，我以后数十年一直保持下来了。

我在第一师范读书，膳食书籍等都是公费，但添置衣服、剃头等零用费，仍无办法解决，家庭既无任何接济，亲友亦无法支援，我问高年级同学类似困难如何解决？他们提出两点：一是参加大门口的贩卖部，先到街上商店进货回来，然后出卖这些文具、纸张、书报、杂志等，以八折计算，领取报酬。即卖出一圆钱货物，可得两角钱收入。每天下午只卖一小时，几个同学轮流来，每周至多两小时，如果生意好，每月可得二、三圆。再一个办法是参加龚桂枝同学组织的印刷装订组，为学校装订发给同学的各种练习本，如英文、作文、数学等练习本，计件付酬，每周搞两个小时，可收入一圆以上，每月可以收入三、四圆，添置衣服鞋袜以及剃头等零用可以解决。1920年下期到1921年上期我就是靠这些办法解决了上述困难。到1921年冬我用每月积下来的钱买了棉衣棉裤和罩衣，添置了一床盖被和垫絮，这时我的物质生活可说已完全改观，心情更加畅